

【理论与政策】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

——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为例

孙吉胜

【摘要】国际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塑造和提升需要多维设计和努力。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当前中国形成了对自身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的认知,这影响了中国追求国际话语权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国际话语权,在外交实践方面通过不同路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提高话语存在、改变语言风格、扩大制度性权力、创新外交实践等。未来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更多实质性努力,如加强整体战略布局、提升各领域制度性话语权、完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外交主导话语向世界话语转变、建立国际话语权提升措施评估机制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继续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在国际层面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担忧、疑虑甚至摩擦,为未来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话语环境,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中国外交;制度性权力;全球治理;外交实践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北京 10003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9.3.19~43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引言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体现,是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意味着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回顾世界历史,一个崛起大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并不代表国际话语权的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有意识的战略设计、多维塑造和全面提升。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94年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从美西战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才成为在各领域都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国家。在这段时间,美国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展开全球战略布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安全领域形成了从欧洲到东

亚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在经济领域,设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经济秩序;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平队”等传播工具,在全球推广美国价值观,逐渐在各领域形成了强势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对国际话语权高度重视,话语权成为中国各领域的高频词,无论是政府层面、学界还是媒体,都经常出现“中国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表述,在外交领域也同样如此。对外交而言,国家通过制定对外政策体现自己的外交理念、价值关怀、国家利益诉求,通过各类外交活动展示国家地位和实力,表达和实现

自己的对外主张和诉求,外交是一个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较易有所作为的领域。^①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强调的话语权的内涵是什么?中国认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状况如何?中国在外交实践方面又是如何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取得了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系统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及效果,探索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为未来中国继续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启示。

二、国际话语权:内涵及影响

话语权有其特殊的内涵,而国际话语权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处于绝对弱势。改革开放后,短短的40年里中国快速崛起为世界大国,也随之出现了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实力极不匹配的失衡状况。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经历、身份的快速变化以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诉求与现实的反差,中国对自己国际话语权形成了特殊的认知,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

话语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指标。权力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学者们对权力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重点强调控制和影响他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最初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关注硬实力,尽管同时也意识到一些软性内容的重要性。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国家强权所依赖的因素包括物质的或物质与人复合的因素和纯粹人的因素两大方面,如地理状况、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状况、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以及外交素质和政府要素等。^②1990年,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了软权力(软实力)概念,权力进而被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两大类。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主要强调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制度等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③更强调权力“吸引”而非“强制”的一面,它在国际关系中同

样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苏珊妮·诺塞尔(Suzanne Nossel)以及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则强调巧实力(smart power),即把硬权力与软权力巧妙结合运用。^④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专门提出了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前者指能够影响他国理念、信誉、繁荣,决定他国行事方向的权力;后者主要指一国让他国做本不愿做的事的能力。^⑤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和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则把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compulsory power)、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⑥秦亚青在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关系理论》中基于中国文化与传统提出了关系性权力,对权力进行了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⑦实际上,在以上对权力的认识中,无论是软权力、制度性权力还是生产性权力都与话语权有关。例如,生产性权力关注话语、社会过程和知识体系,而通过这些,有意义的事物得以产生、确定、生存和转换。^⑧制度性权力则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发言权、投票权等具体权利,这些都会直接转化为影响力。

话语权的重要性首先与话语的本质相关。后现代学者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特别强调话语的社会作用。一是强调话语的建构功能,认为话语不仅呈现、传递信息,具有表象功能,同时也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看,具备了话语权就具备了定义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权力,即话语权决定了定义权、解释权和说明权。福柯强调,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⑨二是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也可以赋予权力,是占有和分配权力的网络。话语可以体现知识和意义的生产,人们也因此把研究对象从语言层面转到了话语层面,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由此编织的权力关系网络。三是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话语可以建构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是产生社会意义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安东尼奥·葛

兰西(Antonio Gramsci)、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都从不同视角探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福柯正是基于话语的以上特征提出了话语权概念,^⑩即通过语言来体现权力,运用权力,^⑪他还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简言之,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言说者以语言、文字或其他文化形式为载体,表达思想观点、解释现象、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权力和权利。^⑫话语不仅强调语言本身,同时也强调一个社会过程,通过语言的积累过程,沉淀为某种话语,最终影响意义,话语是社会文化语境下互动过程的产物。^⑬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衍生出其他系列相关内容,如概念内涵、理论逻辑、核心价值、意识形态、规则、规范等。^⑭具备了话语权就可以继续获得更多制度性权力,而制度性权力又直接影响规则和规范的塑造、制定和实施。正是由于话语权的特殊影响,话语权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各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学界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尤其是在2008年后。在中国知网以国际话语权为主题进行检索,截至2019年2月15日共搜索到812条结果。中国学界出现国际话语权一词是在2007年,主要研究福柯的话语观与中国话语。^⑮2008年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多是从国际传媒角度强调中国需要在媒体领域加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报道和传播能力。国际层面对西藏“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等的歪曲报道使中国更加意识到在国际传播方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到2010年后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才开始扩大至国际关系领域。除了整体研究国际话语权外,如国际话语权的特征、演变特点等,研究还扩展至具体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如外交政策、气候变化、互联网、国际形象、对外宣传、人权、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等。2013年中国政府对提升国际话语权高度重视,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几个重要会上均强调国际话语权,这一年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

的转折之年。^⑯国际关系学界、传播学界、语言学界等领域针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明显增多,议程更加广泛。从研究成果看,从2014年起发表的论文也明显增多:2013年为51篇,2014年增加到86篇,2015年至今每年都有100多篇论文发表。

梳理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话语权有其特殊的定义和内涵。有学者认为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际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体现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涉及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⑰以及对国际议程的动员权,^⑱进而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也有学者强调话语权是指由主权国家通过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使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并认同的能力。^⑲国际话语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及其产生的效力和影响力。实际上,外交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更多是强调国家围绕国际政治议题,以官方外交为主,也借助媒体、民间外交、文化交流等其他渠道,在国际社会参与规则制定、发表意见、传播价值观念,对国际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等的权利和权力,强调一个国家的主张在国际舞台和外交场合的具体权重与影响,事关对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捍卫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世界各国能否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捍卫国家主权、荣誉和尊严,合理承担国际义务与责任等,国际话语权的大小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⑳

尽管福柯最初对话语权强调的是权力,但是本文认同话语权在中国的语境下包含两个层面含义的观点:话语权首先强调表达声音、观点等“说话”的权利(right),指在国际事务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份额、比重等;同时也包含“说话”产生的权力(power),具体指话语、理念或主张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种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是一种软权力、软影响,

通过文本或是话语的形式对外呈现,以进一步改变其他国家的认知或行为。从中国政府在不同语境中所强调的国际话语权可以看出对话语权所强调的不同重点。例如,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里的话语权是强调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年7月,他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时强调,“我们应该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②这里的话语权是强调制度性权力,属于程序性内容,如投票权、份额比重等,体现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性。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会议指出,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③这里更多是强调感召力和吸引力。由上可见,中国所强调的国际话语权既包含纯话语方面的吸引力,也包含制度性话语权以及各种理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认知和诉求

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认识和诉求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模糊认识到日益强调和努力塑造及提升。这种变化同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和自我身份定位密切相关,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实践。

(一)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认知和诉求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远不具备提升话语权的条件和能力,中国还是努力发声。1949年后,中国国力匮乏,经济实力弱,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679亿元人民币,处于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一直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阵营的强势话语和意识形态打压。中苏同盟分裂后,中国又面临苏联的胁迫。可以说,中国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处于缺位状态,加入的国际组织的数量非常少,在制度性权力方面几乎为零,话语权更是无从谈起。尽管如此,毛泽东一直重视话语权的作用,强调通过世界舆论来扩大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他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④而意识形态是理念表达和建构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也可以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⑤面对中国所面临的“话语困境”,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如何巩固和发展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扩大国际影响成为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话语工作的主要任务。尽管中国在这个阶段制度性话语权较弱,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努力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尤其是一些战略主张和政策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苏联围绕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等问题展开论战,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张,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中间地带理论,而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积极发声、提升自身话语权尤其是在概念主张方面的努力。中国也努力在一些重要国际会上发声,阐明自己的观点,如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些努力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⑥对当时加强亚非拉国家的团结,调动相关国际力量反霸,提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中国坚持“韬光养晦”、集中发展国内经济,在国际话语权的追求方面保持低调态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出现复杂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给中国带来了严峻外部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和平演变”势力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封锁、孤立和制裁中国,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话语压力。邓小平冷静观察,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八字方针成

为中国外交多年的主导原则和主导话语。鉴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格局,中国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自己、做好自己的事,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1991年4月2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⑥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有清楚的认知,认为自己还不具备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国际和国内条件,自己即使发言了,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段时间,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中也是低调、选择性参与,甚至保持沉默。在多数情况下,当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对参与结果十分有把握时才会选择参与。^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重视软实力,日益重视国际话语权。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该概念很快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国学界出现了研究软实力的热潮。这种对权力的多维认识也使中国在政府层面对权力和影响力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意识到话语权和软实力对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中国从政府层面开始提出要重视软实力的发展,努力根据中国传统、中国理念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外交主张,也陆续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外交理念,这些理念逐渐成为一定阶段中国的主导外交话语,体现出中国理念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更加体现世界关怀。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使用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一年之后,“文化软实力”概念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政府层面正式明确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追求的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自信心和大国意识开始逐渐增强,而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实力强、国际话语权弱的反差与困境也日益明显。中国在官方文件中开始提及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等,在官方层面也开始提出国际话语权的概念。2008年3月1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中国外交时提到,要“积极开展

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是继“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话语之后,中国国际战略开始向更加积极、更加主动转变,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一些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⑧2008年10月,温家宝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明确提出,要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强国地位与弱势国际话语权的对比更加凸显。国际上对中国的质疑、歪曲也不时出现,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常是“他塑”、与客观事实相距甚远。2010年1月,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中强调,外宣工作要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上迈出新步伐,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取得新进展。^⑨这也是中国首次把国际话语权与对外宣传结合在一起。同年5月胡锦涛在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祝活动时,指出要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⑩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全面的中国进步的形象”。^⑪这体现出中国清楚地意识到对外讲述中国、改善中国形象的重要性。刘延东随后发表解读该决定的文章《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标题直接聚焦话语权。这段时期,中国也日益关注到学术研究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影响。2012年6月,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首次强调国际学术话语权,指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

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要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③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话语权日益重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整体外交层面。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创新,彰显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视。中国更加有意识地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体现在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技术和规则制定等多个领域,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和外延都进一步扩展。2013年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多次强调提升国际话语权,^④国际话语权成为政府层面的一个显性词汇。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⑤2013年9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央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的任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除了中央会议外,在一些重大外交场合,国际话语权也不断被强调。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双方要在国际事务中开展更多的共同行动,携手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⑥除了政府层面高度重视外,在实践中,中国从意识形态、对外

宣传、公共外交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⑦

(三)中国始终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来提高国际话语权

除了强调自身的话语权之外,中国也始终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要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和国际话语权。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历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不断调整内外战略,实现了幅度不一的较快发展。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举世瞩目,这九个国家也因此被纳入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快速发展态势促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发展中大国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需要跻身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的中心舞台。^⑧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在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塑造方面一直居主导地位,导致发展中国家群体在整个世界体系中难有作为。而近年来,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一系列治理失灵甚至治理失败,使全球面临治理赤字。从国际金融到气候变化,从核不扩散到恐怖主义,全球性挑战有增无减。全球治理体系急需改革和调整,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群体话语权成为大势所趋。2018年7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⑨

(四)中国强调要在各具体问题领域提高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对自己世界大国身份的确定,中国意识到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弱势体现在多

个方面,在经济、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明确要求各领域要提升和拥有国际话语权。从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明确要求可以体现出这一点。如经济领域一直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提升经济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一直是重中之重。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⑧针对科学技术,2015年7月16-18日,习近平在吉林省调研时强调,要把装备制造业作为重要产业,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中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⑩在网络安全领域,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指出,目前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⑪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习近平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⑫与此类似,语言学界强调提升汉语的话语权,商业界强调提升定价权等。以上这些努力和要求显示出中国对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需要多维发力,多领域综合提升。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

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不断创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精心设计,主动发声,提高话语存在和话语效力

话语存在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中国的话语存在要首先体现在有来自中国的声音,避免中国的失语状态,不仅包括政界,也包括学界和媒体。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而言也一直存在。例如,在国际媒体中,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都不是由中国人所讲述,中国在一些重大时间点和重要问题上经常话语缺失。^⑬关于中国的学理争辩也经常是在国外学者之间展开,中国人时常处于一种失语境地。针对学术研究,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发文量要比在科学引文索引(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中的发文量低得多。例如,2011年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论文仅有6346篇,且多为经管商务类。近年来,中国学者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文有所增加,但国际学术论文影响力与国外学术论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⑭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化学与材料科学等领域表现良好,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领跑国际前沿,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有限。^⑮这些表明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亟须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外交与国际关系而言,尽管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相关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达到了空前规模,但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是否能有效传递自己的观点就当前的情况看不容乐观,在引领学术议程和学术前沿方面国际影响有限。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在拉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他们所引用的文献和观点多来自美国和欧洲学者,中国学者的声音很少出现在拉美媒体和学界,中国角度的观点自然无法在拉美学界和媒体体现。^⑯因此,中国在国际媒体和学术期刊加大发声,扩大话语存在的任务艰巨而紧迫,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原因,该会议要求构建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打造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⑰在媒体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

中国在国际媒体方面经常发声慢,有时出现滞后现象,导致丧失了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机会。例如,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在伦敦发生了抢夺火炬事件后,西方媒体即刻报道,负面信息成为国际报道主题,而中方的画面由于内部流程和时差等原因,直到传递下半程才进入传播渠道,丧失了传播正面信息的最佳时机。^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布局和新实践,取得了很多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成果。这些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创新也需要争取各国的支持和理解,更需要中国加强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做了诸多努力。

首先,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日益重视话语的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利用到国外进行访问的机会有意识地在当地主流媒体发声,提高中国的话语存在。由于出访前后是当地民众比较关注中国的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的时段发声,关注度相对更高,话语影响更大。例如,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每次到国外进行国事访问时,都会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除了介绍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发展之外,也会专门涉及当地的具体国情以及与中国特殊关系和历史,拉近与国外受众的距离。2017年6月,习近平在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署名文章。2018年1月李克强在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并访问柬埔寨前夕,在柬埔寨柬、英、华文主流媒体《柬埔寨之光》《高棉时报》《柬华日报》发表题为《为澜湄合作与中柬友好架桥铺路》的署名文章。

其次,在面临一些具体问题和挑战时,积极发声,阐明中国立场和观点,避免失语状态。例如,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前后,外交部多位大使围绕南海争端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或接受当地媒体采访,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中国观点和中国立场。在一些重要节点,相关人员在海外一些重要智库的高端论坛上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观点。例如,

2016年7月,当中美关系由于南海问题处于紧张状态时,戴秉国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直接从怎么看世界、怎么看中国、怎么看中美关系三个方面表达中国主张。^⑤2018年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后,傅莹出席宾大沃顿中美峰会,以《书写明天的历史》为题,指出新一代人应能超越传统的大国争霸思维,找到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明确提出世界需要一个“新剧本”,^⑥及时阐明中国立场。

(二)完善话语体系,改变语言风格,增强话语感召力

提升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升话语的感召力。话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既体现在话语内容方面,也体现在语言风格方面。

首先,重视改善话语的时机,拉近与国际受众的距离。话语内容和叙事风格都会影响话语受众对话语的接受度。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与国外受众进行交流时,经常讲述当地故事和成就,增强话语感染力。例如,2016年11月习近平在访问秘鲁时,在秘鲁《商报》发表题为《共圆百年发展梦 同谱合作新华章》的署名文章,指出“秘鲁山水雄奇,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南美洲脊梁’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亚马孙河浩浩荡荡,是矿产、能源、森林、生物资源的聚宝盆。秘鲁人民勤劳勇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印加文明悠久灿烂,马丘比丘遗址、纳斯卡地画等古文明瑰宝令人向往,《山鹰之歌》等安第斯民歌旋律悠扬,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⑦2017年3月李克强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文中以袋鼠和鸸鹋赞扬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澳大利亚选择了两种澳特有的动物——袋鼠和鸸鹋作为自己的国徽图案,因为它们一般只会向前走,不轻易后退,象征着一个永远迈步向前、充满活力的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段都会是让我们向未来前进的动力。我们赞赏澳大利亚这种勇往直前、不断奋进的民族精神”。^⑧

其次,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日益重视个人演讲风格。演讲经常引经据典,也有很多接地气的话、很多形象的语言,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习近平在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生动地比喻成“施瓦布经济学”;在谈到中国坚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时,生动地用到“黑屋子”的比喻:“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⑤该比喻即刻在世界各大媒体引起热议,很多报道直接引用。在2018年中国举办的首届进口博览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这样的比喻对于话语受众而言生动形象,易于理解,容易产生印象深刻。在谈到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⑥生动的语言不仅提升了交流效果,也体现了中国的自信。

最后,讲求对外沟通效果。为拉近和外国听众的距离,演讲经常提及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体现与对象国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利益。例如,习近平在2017年1月7日访问瑞士前在文章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瑞士成为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风格和特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瑞士企业就在华设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工业企业。进入新世纪,瑞士在欧洲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⑦2018年7月,他在访问塞内加尔前在《太阳报》发表《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的署名文章,文中说道:“当年,桑戈尔总统看到中国援助塞内加尔的农业专家同当地人民一样劳动、一样满手泥巴,非常感动。今天,中国专家仍在田间地头,同塞内加尔

兄弟姐妹一起切磋水稻和蔬菜种植技术。友谊在两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2013年,65岁的塞内加尔老人比拉马参加‘感知中国’知识竞赛。他从全球25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最高奖,并被邀请到中国旅游,实现了多年的访华夙愿。”^⑧

(三)扩大制度性权力,提高代表性和发言权

制度性话语权主要体现在通过规则、程序、制度、规范等来影响和塑造他人行为,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在制度领域可以说是后来者,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开始努力融入国际社会,而当时整个世界秩序的主要规则已经制定完毕,中国开启了漫长的学习和融入之旅。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迎来了加入各类国际组织的高潮。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议程设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运转等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相对薄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努力扩大制度性权力,提高代表性、表决权和发言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积极创设国际组织和机构,使中国在一开始就具备制度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几乎没有中国创设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国在此方面的影响力先天不足。而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中的强者经常决定国际制度的基本性质和运行规则,并通过此类制度安排确立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显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的顺利成立不仅体现了中国倡议在全球的成功,也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此类似,中国创设了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除了全球经济层面外,中国在区域合作、区域治理方面也在不断努力,努力创设区域机制,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中拉论坛”以及针对澜湄六国的“澜湄合作机制”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创建机制的努力。

其次,改革和转变现有国际机制,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当前国际社会

的很多国际机制和制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而近年来随着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上升,希望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和转变现有机制的努力。例如,中国努力用好二十国集团这一重要平台,通过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努力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把中国理念融入其中,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同时,中国继续整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在世界银行投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投票权在2010年由原来的2.77%扩大到4.42%,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国,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也由原来的44.06%扩大到47.19%,中国逐步开始拥有在世界银行的核心话语权。^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依据成员国向其缴纳的份额为依据进行加权,而这种加权方式正是美欧国家利用该组织影响世界金融的决策基础,美国对重大事项可以一票否决,发达国家投票权占60%以上。经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2016年1月27日,该组织宣布其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约6%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四个新兴经济体跻身该组织股东行列前十名,^⑨中国在综合决策、阻止行动以及行动倡议方面的能力随之提升。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成功“入篮”,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还创新一些国际机制的运行模式,提升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影响力。例如,金砖国家合作模式从2010年把南非纳入进来之后,正式体现了非洲声音,使其更具代表性。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邀请了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和泰国五国领导人出席,开启了“金砖+”模式。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金砖+”机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开放合作的平台,同时也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的新平台。

最后,努力为国际组织输送高级人才,增加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数量和质量。1971年虽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在此后漫长的30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从2003年开始,中国“缺席”国际组织领导层的局面才开始改观。之后的十余年里中国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逐渐增多。2003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成为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院长。2005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也是华人首次成为该组织“掌门人”。2007年,沙祖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2008年,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要职的中国人。2010年,唐虔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为1944年以来该组织中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也是史上首位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2013年迎来了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的小高潮: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9月,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11月,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2014年,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为该组织150年历史上的首位中国籍秘书长。2015年,柳芳担任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金立群被任命为亚投行首任行长。2016年,财政部官员杨少林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2018年,曲星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向各国际

组织缴纳会费也大幅增加,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⑥不仅如此,中国在高等教育层面增加了相关工作力度,鼓励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和任职,并提供政策帮助和支持。教育部也要求各高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人才,以改变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在人数、职位等方面与大国地位不相称的实际境况。^⑦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门设立到国际组织实习资助项目,支持在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

(四)外交实践创新

中国在外交实践方面也努力进行了许多创新,以期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充分利用主场外交发出中国声音,把中国话语转为世界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重视主场外交,通过主场外交,宣传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例如,中国在人权领域经常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攻击,话语权相对较弱。2017年12月7日,中国召开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凝聚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共同语言,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最后通过的《北京宣言》强调,国际社会对人权事项的关切应始终遵行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这些理念改变了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话语,也将对全球人权治理产生影响。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此次大会是出席人数最多的首次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的高层对话。与此类似,中国还通过举办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亚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重要活动和会议,扩大中国影响力。

其次,主动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努力掌控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纵观中国与国际体系的

关系,中国经历了从局外者到学习者、从改革者到某些领域引领者的演变。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在西方设置的议程之下行事,遵守西方主导下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也日益意识到主动提出倡议,主动设置议程和参与规则制定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明显增多,最典型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最重要的抓手,也成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从概念到行动、从倡议到落实再到收获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把相关130多个国家和组织聚合到一个新的丝路网络中。“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的公共产品,体现出中国改变西方话语下中国“搭便车”形象的努力,也是中国在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它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等精神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带一路”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希腊驻华大使莱奥尼达斯·罗卡纳斯(Leonidas Rokanas)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思路。^⑧在Ebsco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2019年2月,输入“一带一路”,检索出240多篇文章,“一带一路”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中国词汇。

中国除了积极提出倡议之外,也不断提出中国外交新理念。最有代表性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7年1月,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深刻阐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强调天下一家,既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之后,该理念于2017年10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3月正式写入宪法。该理念提出后逐渐被世界理解和接受,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例如,2017年2月10日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指出国际社会要本着合作共

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持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3月1日,中国在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也明确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其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11月召开的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联大一委)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渐由中国话语转为世界话语。此外,中国围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中国梦”等外交理念,同时还提出了中国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体现出中国建立自身外交话语体系的努力。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随着当前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秩序经历转型,由西方建立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不能完全适应变动的时局,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治理体系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之争日益激烈,不仅涉及对原有治理体系的维护,也涉及对原有体系的改革和调整,同时还涉及新的治理机制的创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话语权竞争开始由传统话语权之争更多转向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2015年9月和201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针对全球治理组织集体学习,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努

力,可以看到中国着力在一些领域发挥建设性甚至引领作用,如全球经济治理、金融治理、气候变化等。在多边国际舞台上,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等重要会议努力使一系列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提升中国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机构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在展望2019年中国外交时,国务委员王毅再次强调,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⑥

五、未来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与创新,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未来可以在战略意识、理念、方法、手段等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充分意识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战略设计,需要多维推进、综合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要基于坚实的综合国力和物质基础。早在1894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英国,跃居全球首位,迄今已保持了一百多年。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后,经过半个多世纪才成为一个世界话语权大国,其政策议程、学术议程和媒体议程等都经历了长期的塑造和提升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⑦这也表明,综合国力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备条件,而从崛起国转变为真正的世界大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历练过程。因此,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需对自己的国内基础与国际地位有清晰的认识,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要有战略思维和长远规划,需要多维推进。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影响力会继续增强,在这些领域中国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比较容易取得进展。但是,话语权的另一方面,如影响力、感召力等仅通过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远远不够,还需要媒体、学界等的多维努力,涉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全面提升,话语内容、话语风格、传播手段等的多维互动。例如,学术界的努力直接影响中国理念是否能从中国经验、中

国理念转化为一种世界知识在世界传播,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实质性智力支撑。此外,我们需要注意到,当前国际话语权正在由国家行为体向国际组织、网络、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流散,突破了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原有状况。各类社交媒体和网络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发布和流动模式,也成为展示和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平台。特朗普对推特的运用、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在网络上的发酵等值得深思。

第二,发挥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效应,提升机制创设能力、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话语权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能力,这些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基础。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国际规则领域的话语权竞争。如何在专业领域制定规则、设置国际议程实际上是国际话语权的综合体现,国际议程设置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是否得到认同的关键指标是这个国家能否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制定规则。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当前很多国际议程都是由西方主导,呈现“西强中弱”态势。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主要国际组织的创设、制度运行以及议程设定基本由西方国家主导。在理论层面,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理论,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保护的责任”等不时成为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它们也不时被用来讨论、衡量甚至预测中国外交实践。在实践层面,如南海“航行自由”、气候变化、操纵汇率、全球化陷阱等世界主导话语也都是西方所塑造。因此,中国需要提升这些方面的能力,并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实施运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体现逻辑性、创新性与说服力,以中国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交点为原则,对不合理的国际体制进行规则博弈和秩序重塑。不仅如此,中国所参与的领域不能仅仅限于经济和贸易,还要向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拓展,这些领域是未来拓展中国软影响力的基础。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调整国家战略,

力图维护对国际关系的主导权,给新兴国家带来了更多阻力,它们对中国的焦虑、疑虑会一直持续,还可能增强,甚至可以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安全等领域。中国需要运筹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充分意识到与守成大国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复杂性,同时继续依托发展中国家、动员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及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不完善的愿望,在国际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方面发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影响,而非仅凭一己之力。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是在网络、外空、极地、海洋等新疆域,中国都可以借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其整体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三,努力把中国外交的主导话语转换为影响世界的话语。一个国家的国家话语权除了维护自身利益之外,同时也要对世界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走向产生影响,对于大国而言这是一种责任。当前,在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屡屡“退群”,而中国越来越体现出大国担当时,世界也在期待中国可以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将如何影响当前世界秩序等问题的答案。这些也为中国的外交主导话语进一步转化为世界话语提供了机遇。当前,中国本身已具备了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更有利的客观条件和更强的主观意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例如,以“真实亲诚”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亲诚惠容”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等。但是,由于受文化背景、历史经历、语言与思维差异等因素影响,即使对于同样的话语或行为,处于不同背景中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⑥而对于这些意义高度浓缩、语言简练的外交理念及其表述来说,使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其内涵并非易事。如果宣传解释和行动支撑不到位,这些理念难以引起足够重视,容易变为中国自说自话;如果对其理解不到位,则违背中国提出的初衷。如何使这些外交新理念真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被国际社会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世界影响是当前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升国际话语权所面

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提醒我们在提出一些新理念时需要有充分的论证,使其可以与世界话语接轨。在理念提出后,也要重视对这些理念的精准翻译,尽量避免后续调整。例如,“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标准翻译都经过几次调整修改才最终确定。此外,要充分解释其成因背后的文化传统以及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关联、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影响,阐明其世界意义,这是转变为世界话语的必要条件。

第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话语质量,从话语内容方面增强话语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当前,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各国间的话语博弈也日益增强。各国话语吸引力的强弱除了硬实力的支撑外,话语体系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逻辑论证和具体的表述方式都是影响话语质量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最终要使所传达的信息和思想能够为不同制度和文明下的人们所接受和共享。逻辑说服力、公正的价值理念、科学依据和实证基础等都是影响话语权的要素。^⑥只有这样,这种话语才可能转化为一种世界话语。例如,18世纪以来,以弘扬理性精神为特征的启蒙运动把近百年来西方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理性与科学的话语逐渐取代宗教信仰,成为西方主导话语,并构建了西方话语体系。^⑦话语体系的具体内容是历史与现实的体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完善要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践和逻辑:一是要体现中国的价值观。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如重视“和合”的传统、强调“仁义礼”、追求天下和谐的大同理念等。强调这些价值观并不是对西方价值理念的否定,二者可以相互补充,更好地体现世界的多元性。二是要讲清楚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首先要把这些文化内涵讲述清楚,讲清楚它们与中国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纵观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一直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如强调不干预、互利共赢,援助中不带政治条件,在解决热点和难点

问题时运用武力、制裁总是最后选项,这些与西方的实践存在较大差异。^⑧如果要提升中国话语吸引力,首先要系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文化对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构建的影响,增加话语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三是要讲好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中国在40年内成功使7亿多人脱贫,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成为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发展本身就值得总结、提炼,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和理解。

第五,整体提升中国的国际交流和沟通能力。对于国际话语权而言,除了制度性话语权外,理念与主张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受国际交流和沟通能力的影响。这一方面,中国还存在不少短板。例如,有学者指出2014年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的投入高达100亿美元,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为6.6亿美元,新华社的3000名记者中,约400人派驻在外,但是巨大的投入和中国国际形象的现实并不成正比。^⑨实际上,在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诸因素中,交流(communication)的作用是最明显的。交流作为一种叙事不断地产生、维护、修正和改变现实。^⑩由于各种叙事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同的叙事针对同一事实或实践可以讲述不同的故事,产生不同的交流效果。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对外宣传叙事方式和风格对国内受众有效,但对海外受众缺少吸引力,大多是风格一致的官方信息,有时可信度上存在不足。^⑪中国亟须提升对外交流能力,要加强自觉意识,充分利用有限的话语权平台资源,研究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差异,必要时对一些相关重要人员给予一定的国际交流和沟通能力训练,综合提升国际交流和沟通效果。

第六,要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措施和努力进行效果评估。近年来,随着大国意识的增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效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手段不当或是言过其实的情况,如过于夸大中国实力等,一些争取过度的行为有时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对中国不必要的警觉与防范,进而影响了中国

发展的大环境。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中国强硬论”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美国对中国遏制的增强,有关中国对未来秩序影响的不确定性、担忧、焦虑甚至恐慌随处可见。这就对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行爲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能在国际社会引起过激反应。因此,需要对该领域的工作进行适当评估,发现哪些措施或话语得当,哪些不然,从而进行相应调整。例如,有学者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表决实践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表决基本是保守的,属于防御性表决模式。^③未来,中国可能就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更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减少国际上不必要的猜忌,更鲜明地承担大国责任。鉴于此,中国需要加强对国际话语权本身的相关理论研究,如国际话语权的本质、生成逻辑、消长规律等,同时也需要加大对其实践效果的评估。实际上,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综合国力、文化认同、媒体传播、同人们心理期待的契合性以及制度的比较优势等,增强国际规则话语权,需要深刻把握这些要素与话语权之间的内在联系。^④

六、结语

国际话语权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各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外交也是体现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领域。2008年后开始尤其是2013年后,中国对国际话语权日益重视,在外交领域也进行了诸多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效果,如在世界金融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等成为主导性中国话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当前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中,中国还是处于不利地位。当前主导世界秩序的机制、制度是由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的,中国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方面,尤其是在价值观、理念和主张叙述与传播方面还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学术界在对国际外交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以及国际学术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差距。未来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更多实质性努力,如加强整体战略布局、提升各领域制度性话语权、完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外交主导话语

向世界话语转变、建立国际话语权提升措施的评估机制等。只有这样中国才会继续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话语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担忧、疑虑甚至摩擦。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将可能进一步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张胜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草船借箭”》,载《公共外交季刊》,2014年第5期,第27页。

②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89页。

③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9.

④尉洪池、孙吉胜:《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载秦亚青主编:《当代西方国际思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1页。

⑤苏珊·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谢峰译:《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23页。

⑥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39-75.

⑦参见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⑧赵长峰:《国际政治中的新权力观》,载《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7-109页。

⑨庄琴芳:《福柯后现代话语观与中国话语建构》,载《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95页。

⑩李智:《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载《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年第1期,第200页。

⑪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⑫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页。

⑬吴贤军:《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理论、现状与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⑭赵庆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载《探索》,2017年第6期,第115页。

⑮庄琴芳:《福柯后现代话语观与中国话语建构》,载《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94-96页。检索到的2003年的一篇文章以及2007年的其他三篇文章实际与国际话语权关联度不大。

⑯Naoko Eto, "China's Quest for Huayu Quan: Can Xi Jinping Change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ctober 3, 2017,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7/china2019s-quest-for-huayu-quan-can-xi-jinping-change-the-terms-of-international-discourse>,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日。

⑰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第43页;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第110页。

⑱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载《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0期,第86页。

⑲王啸:《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9页。

⑳张国祚:《努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516/c1003-29277135.html>, 访问时间:2018年6月24日。

㉑习近平:《习近平在巴西国会的演讲: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2014年7月18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296593>,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0日。

㉒《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载《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00.html>, 访问时间:2018年10月3日。

㉔刘一鸣:《试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困境与对策》,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7期,第228-229页。

㉕郑永年:《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载《公共外交通讯》,2010年第1期,第12页。

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㉗孙吉胜等:《参与与互构: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㉘张剑荆:《中国外交进入话语权意识高涨时代》,载《南风窗》,2008年第6期,第26-27页。

㉙《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 李长春出席并讲话》, http://www.gov.cn/ldhd/2010-01/04/content_1502833.htm,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5日。

㉚《俄罗斯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 胡锦涛出席》,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0/020420235938.shtml>,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5日。

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26日。

㉜《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8059720.html>,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5日。

㉝Naoko Eto, "China's Quest for Huayu Quan: Can Xi Jinping Change the Terms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ctober 3, 2017,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7/china2019s-quest-for-huayu-quan-can-xi-jinping-change-the-terms-of-international-discourse>,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日。

㉞《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2636876>,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3日。

㉟《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访拉美四国精彩话语集》,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291774>,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0日。

㊱Kejin Zhao, "China's Rise and Its Discursive Power Strateg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1, 2016, pp. 554-560.

㊲董曼远:《全球17个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 <http://www.chinanews.com/gj/gj-lwxwzk/news/2010/03-29/2196185.shtml>, 访问时间:2018年6月25日。

㊳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80342.shtml, 访问时间:2019年2月12日。

㊴《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五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㊵《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7325865>,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0日。

㊶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7772663>, 访问时间:2019年1月8日。

㊷《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303771>,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5日。

④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361550>, 访问时间: 2018年12月8日。

④④傅莹:《我的对面是你》,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第238页。

④⑤赵蓉英、魏明坤:《中国学者国际学术论文影响力研究——以社会科学领域为例》, 载《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年第7期, 第57页。

④⑥冷伏海、赵庆峰、周秋菊:《中美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基于〈2017研究前沿〉的分析》, 载《中国科学基金》, 2018年第2期, 第240页。

④⑦孙吉胜等:《“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④⑧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第346页。

④⑨傅莹:《我的对面是你》, 第252-260页。

④⑩戴秉国:《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7748.shtml>, 访问时间: 2018年6月23日。

④⑪《傅莹在宾大沃顿峰会指出: 世界需要一个“新剧本”》,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toutiao-onew/1020961/2018-04-17/cd_36044879.html, 访问时间: 2018年6月15日。

④⑫习近平:《共圆百年发展梦 同谱合作新华章》,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16456.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10日。

④⑬李克强:《推动中澳关系向前走》,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47864.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20日。

④⑭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31319.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4日。

④⑮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31319.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4日。

④⑯习近平:《深化务实合作 共谋和平发展》,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430425.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4日。

④⑰习近平:《中国和塞内加尔团结一致》,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578996.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20日。

④⑱吴晓宇:《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的扩大》, 载《中共陕

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0年第4期, 第99页。

④⑲《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 <http://money.163.com/16/0128/14/BEE2M0AG00252G50.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4日。

④⑳《又有一位中国人当上了国际组织高官》,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6-10/8247054.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5日。

④㉑《鼓励支持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全国高校巡讲活动圆满完成》,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shzb/rdzt/gjzzrcfw/dtxx/201705/t20170526_271511.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4日。

④㉒王佳可:《一带一路提供开创性思路》, 载《人民日报》, 2018年1月18日。

④㉓吴志成、李冰:《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第9期, 第4-5页。

④㉔《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625857.s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14日。

④㉕李新烽、冯峰、张萍:《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第7期, 第69-91页。

④㉖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收》, 载《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第3期, 第38-62页。

④㉗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217/c1003-29086917.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14日。

④㉘王翼:《国际话语权演变特点与中国话语建构》, 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6年第4期, 第67页。

④㉙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载《外交评论》, 2017年第4期, 第1-31页。

④㉚Paul SN Lee,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Contest for Discursive Power,” *Global Media and China*, Vol. 1, No. 1-2, 2016, p. 106.

④㉛James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Unwin Hyman, 1989, p. 18.

④㉜Paul SN Lee,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contest for Discursive Power,” pp. 109-112.

④㉝蔡高强:《论国际组织表决机制发展中的中国话语权提升》, 载《现代法学》, 2017年第3期, 第153页。

④㉞张志洲:《增强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国际话语权》,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217/c1003-29086917.html>, 访问时间: 2019年2月17日。